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主办

史学理论与 史学史学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2002年卷

瞿林东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主办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2002 年卷

瞿林东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02 年卷/瞿林东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1

ISBN 7-80190-053-7

I. 史… II. 瞿… III. ①史学理论—文集②史学史—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8566 号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02 年卷

主 编 / 瞿林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出版中心

(010)65232637

责任编辑 / 薛义等

责任校对 / 以 兰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24.25

字 数 / 398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053-7/K·018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语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和读者见面了。“学刊”是反映史学界同仁在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领域之最新进展的一个学术园地。其宗旨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优秀史学遗产，促进中外史学交流，切磋学术，开拓创新，推动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的不断进步。

在中国史学上，史学史意识产生甚早，东汉班彪论司马迁《史记》时，即有明确的反映。其后，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史学上有关“史学史之史”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近人梁启超在 20 世纪 20 年代首先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论述。从那时候起，近 80 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论著，无愧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兴起之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史尤其是西方史学史亦开始有所研究，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明显的进展。

在中国史学上，也有许多理论思考、理论成果。从《国语》的指陈形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恢宏气度，到历代学人的评论历史，以及《人物志》、《帝王略论》、《唐鉴》、《唐史论断》、《读通鉴论》、《宋论》等专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从《左传》的评论《春秋》、班氏父子的评论《史记》，到历代学人的评论史学，以及《史通》、《新唐书纠谬》、《史略》、《史学要义》、《文史通义》、《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专书，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这表明，中国史学在理论方面有深厚的积累和丰厚的遗产。

在 20 世纪的 100 年中，中外史学的联系和交流不断加强，尤其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种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密切。这为中国史学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外国同行不断了解、认识中国史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翦伯赞所著的《历史哲学教程》

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分别是20世纪前期和后期中国史学在历史思想方面的代表作;梁启超所著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和李守常所著的《史学要论》,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面世的一批史学概论著作,描绘了其间中国史学在史学思想方面发展的轨迹。这是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理论成果。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史学在关于理论研究方面和关于自身历史研究方面,都有丰富的资源和相当的基础。但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是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关于史学史的研究,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来说,都还处在逐步树立之中,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前进。

现今,中国史学家关注外国史学的发展及其理论动向的热情甚高;同样,在日本、欧洲和美国,史学界的一些同行也以很高的热情关注中国史学的进展,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当然,历史证明,中国史学家对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自有有一个理解、分辨和吸收的过程;而外国史学家对中国史学,尤其是对丰富、厚重的中国史学遗产的认识、理解和评价,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史学遗产作为世界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应当对它独有的特点和魅力有所认识,中国史学家对此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如果说20世纪揭开了中外史学交流的序幕的话,那么21世纪将使这种交流逐步走向高潮,而中外史学的发展都会因此得到极大的裨益。

2000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同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后,在全国许多同行的支持下,本中心在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收到了积极的成效,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良好的开端,使我们对前景充满了信心。我们将一如既往,同全国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一道,为建设好这一学科,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和中外史学交流竭尽绵薄。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刊出学术论文24篇,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有关论述,这是学科建设方面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总结正反面的经验,在新的形势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如何更准确地历史研究领域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及融汇东西方史学的进展进行理论创新的论述等,也都是学科建设中的重大

问题。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的讨论，也属于此类问题。二是就某个理论问题做专门探讨，如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等。三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专题研究，其涉及范围，上起六朝，下至 20 世纪 50 年代。四是关于史学家的研究。五是关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还有附录两则，是向读者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

编辑、出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是本中心重要的学术任务之一。这一工作，得到了史学界同仁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对此，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至于“学刊”在内容上和编辑上可能出现的疏漏及存在的缺点，恳请史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予以指正。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编委会

2002 年 12 月

目 录

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

- 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何兹全(1)
- 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林甘泉(8)
-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发展问题王桧林(14)
-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庞卓恒 吴 英(27)
- 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问题于 沛(42)
- “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
困境〔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63)

- 论素质教育与历史教育刘家和(77)
- 论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乔治忠(89)
- 六朝史部书籍的时代特性.....〔日〕谷川道雄(103)
- 刘知几史学要论.....施 丁(110)
-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史研究.....邱树森(127)
- 关于 50 年代中国史学的几点评价

- 重读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张国刚(145)

2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论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转型 张 越(152)

关于 20 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张广智(167)

史华慈中国学研究析略 朱政惠(190)

西方城市史学 姜 芃(205)

20 世纪中国对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及其

新史学的研究 李 勇(222)

如何认识章学诚史论的“真价”

——内藤湖南对章学诚史学的高度评价及其

对我们的启示 马 彪(233)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 瞿林东(241)

陈寅恪：诸多领域的建树和治史的“通识” 陈其泰(282)

论民国初年王国维学术路向的转变

及其方法论特征 胡逢祥(295)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五人谈 瞿林东 等(314)

附录一 2001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 汪高鑫(340)

附录二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心大事记 罗炳良(355)

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 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

何兹全

马克思最早谈到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顺序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这段话是常常被引用的。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后面又加了一个社会主义，便成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论。

“亚细亚的”含义，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史学家中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见。但无论他们怎样理解，怎样认识，我总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使用的“亚细亚的”一词的意思，即“亚细亚的”本义，是指前于“古代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阶段。

这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本人的话就可作证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个注里，有下面一段话：“近来流行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共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的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标，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遗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所有制的原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②马克思曾明说“亚洲村社”就是“原始共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页。

主义”，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的“两种主要形式”之一^①。

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本义》。（《社会科学辑刊》1985 年第 1 期）那篇文章是 1950 年写的。当时张政烺（苑峰）或邓广铭（恭三）主编天津《历史教学》，向我约稿，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他，他没有用（没有敢用？）就压下了。在那篇文章里，我论述了“亚细亚的”问题。

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亚细亚的”本义是指“原始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是 1895 年发表的。当时马克思对原始社会虽然由亚洲的一些报道中，已略知古代社会以前还有一个社会阶段的一些史影，但还很模糊。他使用“亚细亚的”地理名称来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称之为“亚细亚的”。这犹如我们今天以人类文化遗址发现的地点，如仰韶、龙山来代表几千年前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一样，以地理名称借用做历史时代的名称。“亚细亚的”本义是指“原始公社”或“原始社会”。马克思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演进的”，有的中文译本译作“向前发展的”。我记得还有译作“顺序的”。无论“演进的”、“向前发展的”或“顺序的”，都说明是前后接续的几个时代。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是明显的前后顺序演进的几个时代，没有理由说前面加上一个“亚细亚的”，却不是前后顺序的、向前演进的一个时代，而是什么别的东西了。

但我今天发言的意思或发言的重点，不在论述“亚细亚的”本义，而在说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发展顺序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是吸取欧亚两洲历史研究的成果而形成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来自欧洲历史；亚细亚的，来自亚洲。这说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顺序的理论是建立在尽可能广泛的人群历史基础之上的。19 世纪，马克思所认识的亚洲社会历史的材料是贫乏的。他所看到的只是些传教士的报告和看到的一些社会情况。但他在这些贫乏的材料里已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人类的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之前的一个更原始的社会。

在远古时代，欧洲、亚洲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但它是人类文

^① 《剩余价值理论》第 3 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465 页。

化、文明开创比较早的两个世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历史学是科学的。马克思在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发现了它们之间历史的关联性。在欧洲“古代的”之前加上了“亚细亚的”原始社会。所以说马克思是在广泛的人群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史学理论，人类历史发展的顺序的。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只在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中传播。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到普通人、青年知识分子脑子里来的，是北伐战争和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次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高潮，因参加论战的人的复杂，有国民党人、有托派、有干部派，又受国民党的压、学术界的排，未能进入教育界、学术界，高潮一阵，也就冷落了。

解放后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官学”，受到党、政的大力推荐、提倡，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理论，虽受教条主义的干扰，仍然得到空前的发展，深入人心。一般史学工作者，都是熟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的，都是对辩证唯物史观心中有数。

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成绩是很大的。但见仁见智，也出现不少问题，出现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认识。随之，也就出现了一些涉及史学理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是极为重要的，亟须解决的。其中大者，可略举以下几条。

一 国家的出现问题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直到西周中期，社会的组成仍主要的是氏族部落。春秋时期，氏族部落虽然在逐步解体，但氏族贵族仍是主要的掌权者。阶级在分化，但还没有发展到矛盾已不可调和的地步。硬说夏商已经阶级矛盾到不可调和，难使人心服。当然，说春秋时期仍是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显然也不合适。

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国家的出现，中间有个发展变化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期。譬如说，在中国历史上直到春秋都属于这个时期。西方学者，倾向于一看见国家特征的出现就说已进入国家阶段，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矛盾已不可调和定为国家的出现时期。为了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可不可以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稍做补充说：夏或盘庚到春秋是早期国家时期，战国才是真正国家出现的时期？总之，如何理解国家的起

源，是个重要理论问题。是一出现阶级或阶级矛盾，就出现国家呢？还是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时才出现国家。

二 古代社会或奴隶社会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用的是古代的。我没有查过，是谁开始的用“奴隶社会”。我总觉得“奴隶社会”名称不顺。称奴隶社会，无非由于在奴隶社会里奴隶是主要的劳动者。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是主要的劳动者，资本主义社会援例是否应当称之为“工人社会”。这不是无理狡辩，这至少是个逻辑性问题。

马克思说过，在罗马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小农经济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他说：“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① 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后的小土地所有制下面再说。这里先说古代社会里的小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的小农经济在古代社会的地位，马克思提得很高，一则说它“占统治地位”，而且是“正常形式”，再则说它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它是受交换经济支配的。交换经济支配小农，使小农破产、流亡、变为奴隶。马克思就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② 就罗马古代社会交换经济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及其和奴隶制的关系说，其过程可分为下面几个阶段：①氏族制分化、奴隶出现。②商业交换经济发展，进一步促使氏族制瓦解，公社成员成为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出现小农经济繁荣的局面。③商业交换经济侵蚀小农，土地兼并集中，小农破产沦为奴隶。④生产衰落，奴隶向农奴转化。这里看到：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受交换经济的支配而沦为奴隶。

在古代社会，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城市交换经济，是商人阶级。他们一般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有点像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小农和奴隶都是受交换经济和商人阶级的支配的。古代社会能否称作奴隶社会？我看不能。但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小农经济？如何看待交

① 《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② 《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

换经济的支配地位？这都是些应当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 封建制与农奴制

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中世封建社会才出现的，在氏族公社解体过程中出现奴隶制同时也出现了农奴制。恩格斯说：“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原始氏族公社解体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① 1882年12月22日，马克思逝世的前一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还说：“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

农奴制不是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识，他们达成协议了。而且是晚年的共识，再没有新认识、新理解出现。

这问题如何理解？我们特别要注意，要重视。尤应找出新认识、新理解。在中国，过去我们几乎是一看见农奴、依附民，就认为是封建社会了。显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可以创新，马、恩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有这个意思，但要研究的，是否一有农奴就是封建。

四 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体是东方社会的本体，是数千年来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如马克思说：“目前还部分的保存着的原始的规模小的印度公社，就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及固定分工之上的。……这种公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的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起来。这种公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0页。

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相反，亚洲的社会都没有变化。”^①又如恩格斯说：“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们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②

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亚细亚的”这一引申和对亚洲整个历史的认识是错误的。就中国历史来说，都是有阶段性地发展着的，并没停留在原始社会或原始社会的末期连奴隶制生产方式都没有进步到。

但我这里也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这要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说专制制度是封建制度，是封建社会。

如何理解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 * *

* * *

* * *

马克思时代，对东方亚洲，中国的认识是比较贫乏的。现在我们对中国史的认识，虽然还有很多不同的争论，我们毕竟有了几十年的研究和积累，我们积累了对东西方历史研究的知识。我们比马克思对亚洲历史的知识多多了。

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新的史学思想理论进入中国，很受欢迎。辩证唯物史观有些不迎时。当然，这些思想、理论都是先进的，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意义。但我仍然深信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现在最先进的史学理论，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是不会被挤出历史舞台的。

真理不怕辩论，真理愈辩愈明。

是时候了。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辩证唯物史观和东西方历史、中国历史，都有了些知识和积累。我们要在对东西方历史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把各种历史理论公平地摆在评判的桌面上，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实践和真理面前，该扬弃的扬弃，该发展的发展，推动辩证唯物史观，向更高的境界开展。

2002年10月23日

① 《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5～397页。

② 《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7页。

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

林甘泉

无论是回顾史学走过的历程，或是展望 21 世纪史学，都要重视史学理论。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实证研究，但是不管你自觉不自觉，在理论和方法上总是有一个导向的问题。新世纪中国史学要与时俱进，需要我们对史学理论的建设予以更多的关注。对此我想谈三点意见。

第一，对于历史学的性质和特点应尽可能求得一个共识。什么叫历史的真实，历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历史学的任务和功能是什么，等等，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有过讨论，但各人的理解并不一样，许多意见分歧，其实都与对历史学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不同有关系。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常听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又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只有史料的实证才是真正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经不起检验的空论。这里就涉及对历史学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问题。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我的看法是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但它又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经过实验检验的精密科学。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判断，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傅斯年讲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近代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照我的理解指的就是这个层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属于这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要解决的是史料和史实（包括人物、事件、制度等）的确认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掌握材料的多少和真伪。对史料的取舍和识别也有科学和不科学之分，我们通常说的历史学者的基本功就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就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来说，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因为它基本上使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我过去就不赞成笼统地把考据学贴上“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事实判断这个层次上，我们反对无聊的繁琐的考证，但对于封建社会的学者和资产阶级学者有价值的考据学成果都需要继承，而且也应该在这个研究层次上努力提升自己

的素养。可是历史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事实判断层次上，也就是说不能把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第二个层次叫什么，我没有完全想好，是不是可以叫认识判断。在占有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之后，你怎样认识一些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和一些深层次规律性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就呈现出来了。用英雄史观、文化史观来观察历史发展，肯定与唯物史观得出的结论不同。胡适曾经说，历史研究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科学的，一部分是艺术的。他所说的科学的部分，就是傅斯年说的史料学；他所说的艺术的部分，亦即他说的历史像一个女孩子可以随我们任意打扮和涂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时，把他对考据学的一些主张，都当做主观唯心论来批判，是混淆了历史研究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顾颉刚先生在这方面的认识比较进步。他说他的《古史辨》是做基础性的工作，他不反对唯物史观，而是希望自己的工作“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底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研究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方便了”。他还承认“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先前的史学家就不能探讨深层次和规律性的问题。司马迁说他撰写《史记》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已经涉及历史研究的事实判断和认识判断两个层次的问题。近代的实证史学家，有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事实判断的层次上，有的则不仅在事实判断层次上，而且在认识判断层次上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对历史的深层次和规律性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也是与时俱进的过程。比如陈寅恪先生，他所以比乾嘉学派的一些学者高明，是因为他受到西方近代史学的科学方法的训练。他讲隋唐制度的渊源，讲唐代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与山东集团、关陇集团的关系，都是比较深层次的问题。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是大家公认的，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未必都为同行所认同。例如，他认为隋唐制度的渊源主要在北魏、北齐，不在西魏、北周，有的学者就不完全同意，因为他讲的制度着重谈的是礼仪制度，而对均田制、府兵制等则很少涉及，这就不免有片面性。陈寅恪先生是主张历史研究要有通识，要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线索的，但是他过分强调种族、文化因素的作用。这可能与陈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情结有关系。和他的历史观比较起来，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指导思想应该说更科学、更深刻一些。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帮助我们可以找到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线索和决定性的因素。历史研究的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判断，即探讨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在这个研究层次上，就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跟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分歧了。同样的实证史学家或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做出价值判断的时候，个性的色彩就更多一些。比如说对秦始皇，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以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有的着重批判他焚书坑儒的暴政；有的就更多地强调应该看到他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价值判断，除了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之外，还往往跟当时研究这个问题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关系。过去陈守实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说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正像政治经济学的价格可以随着价值上下波动一样。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我们应该承认，在不同的时候和场合，评价一个人物也好，一个事件也好，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但是这种差异要遵守一个度，即不能背离历史的真实。历史存在是客观的，在事实判断的层次上，是非的标准也应该是客观的，其结论是可以经验材料来加以检验的。但在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层次上，虽然可以检验其事实判断的基础是否可靠，但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结论却带有主观的成分，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论定其是否正确。记得好像有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历史学理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客观”转向“主观”。我想这可能是历史学更关心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更重视人文关怀的一种反映。总之，在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层次上，学者们的不同见解只能通过切磋、讨论和比较，让读者来判断谁的见解更深刻、更全面和更有说服力，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学术史的发展表明，在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层次上，先进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说明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和本质，但不能说一个人只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各种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解就都能准确无误。同样，一个学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第二，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一些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都要有结论，学科建设才算有成绩、有发展。长期讨论得不到共识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庸人自扰的“伪问题”？我认为不能这么说。比如长期聚讼纷纭的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也就是所谓“五种生产方式”问题。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末算起，讨论七八十年了，而且看来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